

导 言

世上想必有许多类似本人的父母，他们急切地要使自己年幼的孩子接受尽量好的教育，但又不愿意让他们受到多数现存教育机构的恶德败行的影响。这些父母的困难仅靠孤立的个人努力是无法解决的。诚然，他们可以通过聘请家庭教师的方式，在家里教养孩子。但是这种作法会剥夺孩子本性所需要的伙伴关系，而缺乏交朋友之道，教育的若干基本要素必定缺乏。此外，让一个男孩或女孩感到自己“形单影只”（odd），与他人有别，则极为有害；这种因父母而产生的情感，几乎肯定会使孩子迁怒于父母，并导致他们对父母视为寇仇的一切事物却奉若至宝。基于上述考虑，谨慎的父母也许会被迫将自己的子女送入那些他们深知有严重弊端的学校，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觉得现有的学校无法令人满意——或者即使有差强人意的，也难以在邻近街区觅得。因此，对于那些慎重的父母而言，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项改革不仅对社会有益，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有利。如果父母境况优裕，解决他们的个人

作者在本书中提到儿童或孩子时，不少地方和此处一样，将男孩与女孩并列提出，似乎显得累赘（译成中文也是如此）；但译者认为作者这样行文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即强调男女教育平等。故在译文中，有关地方全部按作者原话直译。——译者注

问题则无须使所有的学校都变好，只要邻近有所好学校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那些身为工薪阶层的父母来说，除非改革在小学遍地开花，否则他们的要求就无法满足。鉴于一方父母会反对另一方父母所企望的改革要求，除了进行强而有力的教育方面的宣传——其成效或许只有到改革者的子女长大成人后很久才被证实——舍此无其他途径可寻。因此，出于对自己骨肉的挚爱，我们将不得不逐步涉及更广阔的政治和哲学的领域。

本人希望在本书下面的各章节中，能尽量避开这一较广阔的领域。我所必须阐述的意见大部分并不取决于我对所处时代重大争论可能偶然持有的观点。然而在这方面的完全超脱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必定依赖于我们关于人类性格的理想以及对他们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例如和平主义者不会希望他们的孩子接受军国主义者所喝彩的教育；共产主义者的教育观自然也会与个人主义者的教育观泾渭分明。更为根本的分歧则在于，人们在以下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有些人视教育为灌输某种明确信仰的手段，另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应当致力于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试图回避与此相关的问题则纯属徒劳无益。与此同时，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里为数可观的新知识已经面世，它们则超然于上述原则争论之外，并与教育息息相关。这些新知识已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然而在这些新知识的教诲被人们充分吸收之前，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生命的头五年；人们已经发现，生命的头五年对于人一生的意义比人们过去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因此就使得父母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相应增加。我的目的与宗旨是尽己所能，避开有争议的问题。驳诘的文字在某些地方是必要的，但是面对为人父母者陈词时，他们也许会赞许为其后代谋福祉的真诚愿望，仅仅依据这一点，再加上现

代知识，就足以解决诸多教育难题。我所必须阐述的意见乃是我为自己的孩子寝食不安、百感忧思的结果；因此，我的意见不是遥远的、不着边际的，也不是纯理论的；无论人们赞同或反对我的结论，我希望它们或许能有助于澄清那些面临同样困惑的父母的思想。父母的观念是异常重要的，缺少专门知识往往是父母成为最优秀教育家的羁绊的原因。我确信如果父母渴望其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愿意并有能力提供这种教育的教师决不至于匮乏。

在以下各章，首先我打算考察教育的目的：即通过对儿童因材施教的方式，能培养出我们所能合理希望看到的哪一种类型的个人及哪一种类型的社会。我漠视人种改良问题，无论是通过优生学或通过其他任何自然的或人工的方式，因为它们实质上已超越了教育问题的范围。但是我极为看重现代心理学领域的新发现，因为它们倾向于表明：早期教育可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品性，相形之下，过去那些即使是最充满激情的教育家也对此估计不足。我将品性教育与在严格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教学 (instruction) 的知识教育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有用的，虽然不是最终的：某些美德是一个接受教学的儿童所需要的，而大量的知识则是众多重要美德的成功实践所需要的。然而为了便于讨论起见，可以将教学与品性教育脱钩。我将先论述品性教育，因为它在人生的早期尤为重要；我还将把这一话题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并且要在此标题下讨论甚为重要的性教育问题。最后，我将讨论智育，包括智育的目标、课程以及智育的各种可能性，我要从发蒙儿童学习读写的第一课一直谈到大学岁月的终结。至于男女从生活和社会中继续受教育的问题，则不在我要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毋庸置疑，使人们有能力从经验中学习，应成为早期教育在观念上极端注重的目标之一。

上 篇

教育与美好生活

本篇篇名在英国版本中名为「教育的理想」。——译者注

第一章 现代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

当人们现在阅读前人的——哪怕是最优秀的——教育论著时，会感到教育理论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19世纪前，教育理论的两大改革家是洛克和卢梭。他们享有盛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都批驳了当时广为传播的诸多谬误。但不管是洛克还是卢梭，在属于他自己的方向上，均未达到现代教育家的境界。例如，两人都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但两人思考的却只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这是需要一个人花费他的所有时间去专心从事的。即使这种制度的成效可能超凡出众，但凡具有现代眼光的人均难给予认真的关注，因为每个儿童都占有一个成年家庭教师的全部时间，仅从数学的角度考虑，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特权阶层才能采用这一制度；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这一制度绝无存在的可能。虽然现代人也许会在实际中为自己的孩子谋求特殊的利益，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采取某种教育措施，使得教育向所有儿童开放，或至少使每个有能力从教育中获益的人都能受到教育，这一理论问题才能解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富人立即放弃现实社会里尚未人人拥有的教育机会。如

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是英国哲学家及教育思想家，其教育名著是《教育漫话》；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及教育思想家，其教育名著是《爱弥儿》。——译者注

果那样做就是为公平而牺牲文明了。我的本意是，我们所追求的在将来才能产生的教育制度乃是一种能为每个男女性童都提供享受现存最佳机会的制度。理想的教育制度必定是民主的，尽管这种理想不会立即成为现实。我认为，就这一理想而言，现在已得到公众普遍的赞同。在此意义上，我自会将民主时刻牢记心间。我所倡导的一切主张都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与此同时，如果某人有能力 and 机会使其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自然也不应当牺牲子女，去受一般教育的掣肘。即使是这种最起码的民主原则，在洛克和卢梭的著作中也是缺乏的。尽管卢梭并不信赖贵族政治，但在涉及教育问题时，这种不信任感却并未流露出来。

澄清民主与教育的关系甚为重要。在此问题上坚持死板的整齐划一必将成为一场灾难。有些儿童比同龄人更为聪颖，并可从较高深的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益处。有些教师受过较为优良的训练，或是在天资上比其他人更具备当教师的禀赋，但要求所有儿童个个都受教于这些为数有限的杰出教师则是不可能的。对于是否应让所有的人都享有接受最高等教育机会的问题，我甚为怀疑，而在目前立刻办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生硬地贯彻民主原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无论谁都与这种教育无缘。倘若采纳这种意见，必将使科学进步遭受重创，并且使得普通教育的水准在今后百年内不必要地在低水平徘徊。不宜以牺牲进步来求得现阶段的机械平等；我们必须谨慎地接近教育上的民主，以便在此过程中尽量少破坏那些与社会不平等偶然相关的有价值的产物。

但是，倘若一种教育方法不具备普遍适用性，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富人家的孩子通常除母亲外，还有奶妈、保姆服侍，可以使唤家中其他的仆人；然而在任何社

会制度下，都不可能为所有孩子提供这种待遇。受到这种娇生惯养的儿童从并非必要的寄生生活中是否真可受益，十分令人怀疑，但任何一位不持偏见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建议给少数人以特殊的优待，除非有特殊的理由——例如对待低能者或是超常者。在当今生活中，只要可能，睿智的父母都会喜欢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某种在事实上并非普遍的教育方法。为实验起见，父母应当有尝试新方法的机会。不过，若是这些新方法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则应当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而不至于因其性质特殊，而只能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幸运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若干最佳要素具有极民主的起源；例如，蒙台梭利女士的工作就是肇始于贫民区的幼儿学校。在高等教育中，为特殊人才提供特殊机会乃是不可或缺的措施，然而不能因此就有理由断定：任何一个儿童只因可能选择了面向公众的教育制度，就会吃亏受损。

教育中的另一种现代趋势与民主有关，或许更有公开讨论的必要——我指的是与其重视教育的装饰功能，不如重视其实用功能的趋势。装饰与贵族的关系已在凡勃伦所著的《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①一书中作过深入的探讨，但与我们有关的只是这种关系中的教育方面。在男子教育中，这个问题与古典教育和现代教育之争紧密联系；在女子教育中，它是“淑女”(gentlewoman)的理想与培养自强自立女性的意愿相互冲突的一部分。但与女子有关的整个教育问题已被男女性

① 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是意大利幼儿教育家，1907年在罗马贫民区创办名曰“儿童之家”的幼儿学校，取得极大成功。后来她把在此校的执教经验写成著名的《蒙台梭利方法》一书。——译者注

凡勃伦(Veblen, 1857~1929)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此书为伦敦乔治·艾伦及昂温有限公司出品。——作者原注

别平等的愿望所曲解：一直有人试图使女孩获得与男孩同样的教育，尽管这种作法本身并不值得称道。其后果是：女教育工作者们遂将诸如同级男生所学习的“无用的”知识也传授给女生为目标，并且成为“母亲技术训练应是女子教育的一部分”这一观念的激烈反对者。这些相反的思潮使我正在讨论的教育发展趋势，在与女子有关的方面变得不甚明晰，但“窈窕淑女”（fine lady）理想的破灭乃是这一趋势的最明显的例证之一。为避免对这一问题的迷惑纷争，我暂且将我的讨论局限在男子教育的范围内。

许多有关其他问题的单独的争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男孩应以学习古典学科为主还是以学习科学学科为主？在对有关问题的思考中，有人认为古典学科是装饰门面的，而科学是实用的。教育应当尽快成为某些行当（trade）或职业的技术培训吗？此处，实用与装饰之间的争论切中要害，虽然并非决定性的。应教儿童学会既能准确地发音，又具有优雅的仪表吗？或者这些只不过是贵族的遗风？又如艺术的鉴赏，除开艺术家外，对其他人是否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呢？还有字的拼法是否应当音形一致呢？凡此种种以及许多其他争论，在较量时，都部分地采用了实用与装饰之争的论点。

然而，我相信所有争论都是不着边际的。只要对有关术语加以界定，争论就会烟消云散。倘若我们将“实用的”作广义的解释，将“装饰的”作狭义の説明，则会是一方获胜；若作相反的解释，则是对方获胜。对上述词汇作最广泛、最正确的理解，有良好结果的行动就是“实用的”。那些结果除“实用”外，必须是“良好的”，否则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定义。我们不能声称实用的行动就是有实用结果的行动。所谓“实用”之物的实质在于它有助于产生某种不仅仅是实用的结果。有时需要一

长串连锁的结果才能达到堪称为“良好的”最终结果。犁之有用是因为它可用来耕地。但耕地本身谈不上是什么好事，只是因为耕地之后能够播种，方才变得有用。播种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能产生粮食，粮食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能产生面包，面包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能维持生命。但生命必定具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如果生命只有作为其他生命的工具方才有用，那就毫无用处了。生命可以为善，亦可为恶，全视环境而定；因此，当生命成为美好生活的工具时，它将是有益的。我们总得在某一地方超越那根环环相扣的功利的链条，找到一个可用于悬挂链条所需的钩子；否则，该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将丧失实际用途。当“实用”的定义被以这种方式所限定时，教育是否应当实用的问题就化为乌有。既然教育过程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并非目的本身，教育自然应是实用的。但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那些倡导功利主义教育的人的想法。他们极力主张教育的“结果”应当是实用的。率直地讲，他们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机器的人。如果我们问机器有何用途，他们最终的回答就是机器能生产肉体所需的必需品及慰藉品——如食品、衣服、住房等。由此，我们会发现，那些观点甚为可疑的急功近利的倡导者是仅仅赋予肉体的满足为内在价值之人；在这种人看来，“实用”就是有助于我们满足肉体的需要及欲求。当实用的意义果真如此时，倘若功利主义的倡导者是在阐述一种终极的哲学，那么他必错无疑；不过在一个平民百姓普遍忍饥挨饿的社会里，主张实用的人作为政治家或许是对的，因为肉体需要的满足较之它物，在此时此刻也许更为迫切。

考察本论题的另一面时，与此极为类似的分析亦属必要。诚然，称呼另一面为“装饰的”是对倡导功利主义者的一个让步，因为“装饰”一词理解起来多少有点流于无关紧要之故。用

“装饰的”一词形容“绅士”或“女士”这一传统概念，极为贴切。18世纪的绅士用纯正的语音说话，合适之处引经据典，穿着时髦，熟悉礼节，还知道何时决斗有利于提高其名声。在《鬻发遇劫记》(The Rape of the Lock)^①一书中，有这样一个，他

吸着足以表现虚荣的琥珀鼻烟壶，
并以优雅姿势握着一根云头状的藤杖。

他的教育是最狭义的装饰，在我们现代人中，只有极少数富人有望获得这样的教育。旧时意义上的“装饰的”教育理想是贵族化的，它只能假定属于拥有大量钱财而无需工作的阶级。回顾历史时，那些高雅的绅士及雍容的贵妇颇具魅力；他们的回忆录连同乡间住宅带给我们一种我们不会再为子孙后代提供的令人愉快的感受。但他们的美好之处即使是真的，也决不意味着超凡脱俗，况且那些东西都是极端奢侈的产物：贺加斯的《杜松子酒巷》(Gin Lane)曾将其代价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人会提倡这种狭义的装饰教育了。

但这还不是真正的论题。真正的论题是：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应使心灵充满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知识，还是应设法将对自身完善有所裨益的精神财富给予我们的学生？知道1英尺有12英寸，1码有3英尺是有用的，但是这种知识缺乏内在价值，对于

^① 《鬻发遇劫记》是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的讽刺长诗。本页的两句诗即引自此诗。——译者注

贺加斯(Hogarth, 1697~1764)是18世纪英国讽刺画家及雕刻家。——译者注

那些生活在使用米制地区的人来说，它就全然无用。另一方面，欣赏《哈姆雷特》（Hamlet）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多大用处。除非碰到某人恰巧想杀死他的叔叔这种极其罕见的例子；但它却能给予人以一种精神财富，缺乏这种财富则会使人感到遗憾，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财富还会使一个人成为人类更为优秀的一员。那些反对将功利定为教育的惟一目标的人，更为器重后一种知识。

在功利主义教育的倡导者及其反对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三种具有不同实质意义的争论。第一种为贵族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主张，特权阶级应当学习利用闲暇，去做自己一心向往之事，而平民百姓则应被教会从事那些对他人有益的劳动。民主主义者对于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不免显得有点混乱：他们一方面不赞成向贵族阶层传授缺乏实用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又声称工薪阶层的教育不应仅局限在实用的范围内。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民主主义者反对在公立学校中进行旧式的古典教育，同时又提出打工族应当具有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机会这一民主主义的要求。尽管这种态度在理论上也许不够明晰，但就整体而言，实际上却无可非议。民主主义者不希望将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崇尚实用，另一部分则讲究装饰；因此他主张多向崇尚装饰的阶级授入纯粹实用的知识，并且多向讲究纯粹实用的阶级授入纯粹娱乐的知识。然而民主主义本身并未对这些比例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二种争论为物质利益至上者与精神愉悦追求者之争。假

《哈姆雷特》是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于1601年创作的一部悲剧。剧情有王子哈姆雷特之父被其弟（即哈姆雷特之叔）谋害并篡位，哈姆雷特被父亲鬼魂告之其死因后，设计除掉了其叔。——译者注

如境况优裕的现代英国人及美国人被魔法带回伊丽莎白时代，恐怕其中绝大多数人情愿返回现代世界。因为当时的社会虽有莎士比亚、雷利及菲利普·西德尼爵士这样的名士，有优雅的音乐，有美丽的建筑，但如果缺少浴室、茶和咖啡、汽车及其他当时人们尚不知道的物质享受，他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这类境况优裕的现代人——除掉迄今仍受保守传统影响者外——都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增加商品的数量及种类。他们也许能将医学和卫生学包容进去，但对文学、艺术或哲学则显示不出任何热情。毫无疑问，这些人构成了攻击文艺复兴时期所设置的古典课程的主力。

对待这种态度，我并不认为仅仅声称精神的东西较之纯物质的东西更有价值将是公允的。我相信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却不是全部真理。因为物质的东西（physical goods）虽然缺乏极高的价值，但物质上的不幸（physical evils）却可能极大地损害精神的优美。自从人类有了先见之明，饥荒、疾病以及对它们的不绝的恐惧就使得大多数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鸟类大都死于饥饿，但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无忧无虑，因为它们从不考虑将来。然而从饥荒中幸存下来的农夫，则将时时被记忆与恐惧所困扰。

人类宁可长时间地辛勤劳作，以换取微薄的收益，也不愿溘然离去，命丧黄泉；动物则不然，当快乐可得时，宁愿以死作代价，换取一时的快乐。多数人之所以能够忍受乐趣被剥夺

① 伊丽莎白（Elizabeth I, 1558~1603在位）为英国都铎王朝国王。她所处的时代属于文艺复兴时期。——译者注

② 雷利（Raleigh, 1552~1618）是英国军人兼探险家；菲利普·西德尼（Sir Philip Sydney, 1554~1586）是英国作家兼军人。——译者注

殆尽的生活，是因为不这样做生命之火就会熄灭。如今由于工业革命及其副产品，有史以来，创立一个人都享有合理的幸福机会的社会，首次成为可能。只要我们愿意，物质上的不幸可以减至极低程度。通过组织与科学，可使世上人人有饭吃、有房住，虽谈不上奢华，但可谓温饱与安居了。此外，疾病可加以制服，慢性病也会变得罕见。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应的增长也将成为可能。使得人类潜意识一团漆黑的巨大恐怖会带来残酷、压迫和战争^①，而现在这种恐怖的感觉可以大为降低，以至变得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对于人类生活均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我们岂敢反对那种可以带来上述一切变化的教育呢。在这种教育中，应用科学必将成为主要成分。缺乏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我们就不能建立新世界，但少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少了但丁和莎士比亚，少了巴赫和莫扎特，对于建成这样一个新世界却无大碍。这是赞成功利主义教育的有力论据。对此我曾大声疾呼过，因为我觉得这一证据是颇有说服力的。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人们不知如何利用闲暇与健康，那么获取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反对物质的弊端的战争，如同所有其他战争一样，决不能应用那种使人们丧失和平之术的颠狂心态进行。决不能让世界所具有的至善，在与邪恶的斗争中化为灰烬。

现在让我来讨论一下包含在我们第三种争论中的观点，即是否只有无用的知识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否任何具有内在价值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就我而言，年轻时，我曾在拉丁语与希腊

^①“巨大恐怖”指的是疾病及饥荒等危害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作者意思是：由于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其潜意识（此处是套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指人的原始冲动、本能及被压抑的欲望）趋向邪恶。——译者注

语上耗费过许多光阴，但现在想来，感到那些时间几乎全部白费了。古典学科知识对于我以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帮助。与古典学科学习者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样，我对古典学科从未达到精通的程度，阅读时毫无快感可言。我曾学过诸如“suppellex”一词的所有格之类的东西，而且一直不曾忘却。这种知识较之“1码有3英尺”的知识，并不更具有内在价值，它对我的用处就只是能使我举出上面这个例子而已。另一方面，我所学的数学和科学不仅极为实用，而且具有重大的内在价值，例如可提供沉思默想的题材，在这充满欺诈的世界里，还可作为真理的试金石。诚然，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的特性，但我确信无疑的是：从古代经典中获益的能力在现代人中乃是更为罕见的特性。法、德两国也不缺乏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其语言易学，且有许多实际用途。因此，若将法语、德语与拉丁语和希腊语相比，拥护前者的理由必然占据压倒优势。即使对不具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知识并不轻视，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正当的要求：除去专门人材的教育外，此类知识的学习不应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技术装备（诸如语法）部分。人类知识的总量以及人类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增长之中；因此，若有时间研究新的事物，每代人都必须修改其教育方法。我们必须通过妥协以保持平衡。教育中人文主义的要素必须保留，但也应当充分简化，以便留出地盘，让给其他的要素；若缺乏其他的要素，那么因科学的蓬勃发展而可能建立的新世界，就只能永远是画饼而已。

我并不是想暗示，教育中人文主义的要素不如功利主义的要素那么重要。欲使富有想像的人生得到充分发展，通晓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掌握一些世界史的知识以及对音乐、绘画和建筑有所了解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只有通过想像才能领略未来

世界的模样，否则“进步”将变成机械的和不足挂齿的。然而，科学也能激发想像。在我的孩提时代，天文学和地质学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较之英、法、德等国的文学要大，因为我阅读这些国家的文学名著大都是被迫的，缺乏丝毫兴趣。这是一个涉及个人的问题：一个男孩或女孩从这一源泉获得鼓励，另一个男孩或女孩从那一源泉获得鼓励。我的意思是，当掌握一门学科需要困难的技术时，除专门人才的训练外，那门学科应当是实用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现代语言写成的伟大文学作品为凤毛麟角，然而时至今日，此类作品已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希腊传统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传达给那些不懂希腊语的人；至于拉丁传统，其价值并非真的很大。因此，对于那些缺乏特殊才能的儿童来说，应在无需掌握学问的重要装备（*great apparatus of learning*）^①的情形下，为他们提供人文主义教育的要素；在以后的几年中，作为一种通例，应将较为困难的学科仅限于数学和科学。但如果有某种强烈的倾向或特殊的能力指向其他方向时，就要对有这种倾向和能力的儿童破例。刻板的规则（*cast-iron rules*）总是首当其冲地被列入应避免的规则中。

至此，我们一直在考虑应当传授何种知识的问题。现在我要转向另一种问题，部分是有关教学方法，部分是有关道德教育和品性训练。这里我们不再涉及政治学，而要涉及心理学和伦理学。直到最近，心理学还只是一种学术研究，极少应用于实际事务。然而这种情况现已彻底改观。例如，我们现在已有了工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极具实际重要性。我们也许可以希望乃至预期，心理学对于我们各种风俗制度的影响不久会迅速增加。无论如何，教育已深受

① 学问的重要装备指的是古代语言，即希腊语、拉丁语。——译者注